

笔谈

构建美国研究自主知识体系

编者按：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知识体系全球影响力提升的必然环节。区域国别学作为新兴的一级学科，需要在各个区域国别研究方向大胆探索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美国研究是当前国内区域国别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发展相对比较成熟。2023年5月25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召开了圆桌论坛，围绕“构建美国研究自主知识体系”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本刊在此次论坛中，选编了四篇具有代表性的发言稿。这四篇发言稿侧重点不同，展现了国内学界对于更好构建美国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思考。

构建中国美国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吴心伯)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宏大的时代课题，其中的重要一环是要构建中国美国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

我们先看一下美国对当代中国研究的知识体系的构建。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量投入对当代中国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最后建立了一个美国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它对当代中国的一个叙事框架和基本逻辑，也是美国不同时期对华政策的理念基础。美国这一套知识体系也影响到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知，现在很多国外的中国问题研究基本上都是引用美国学者的观点，这就是话语权，甚至可以讲是话语霸权。不仅如此，甚至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法律的时候也要参考美国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成果，这就是美国的软实力。

当代中国的美国研究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发展起来的，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总体上还处在初级阶段。中国的美国研究，大致上会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临摹，如同画画模仿别人的成果，我们这个阶段的美国研究主要是参考学习美国人的美国研究成果，因为美国的美国研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做得最发达，我们很长一段时期是在借鉴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吸收、消化和加工。

第二个阶段是解剖，就像医学上通过解剖对象来认识其内部构造和机理一样，这个阶段的美国研究开始通过田野调查得到第一手材料和第一手数据，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原创性的观点，包括一些重要的概念、范式和理论，同时，也对美国学者的一些主要观点进行解构与批判。

第三个阶段是体系化，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美国研究的基本概念、理论和一套指标体系，用它们来分析研究美国，只有到了这个阶段才可以说我们形成了关于美国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对中国学者美国研究的原创性观点进

行系统性的学理表达，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美国研究知识体系。

如果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我们的成果不仅可以为我所用，也能与美国学术界进行平等的对话，还可以影响到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研究。

当下中国美国研究的发展方向有如下特点。

一是从政治学向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改革开放后的美国研究重视应用性，使得研究本身带有很强的政治学属性，重视对美国政治、经济、外交、战略的研究，对其历史、社会、文化、种族的关注度较低。在推进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建设过程中，我们的美国研究要更加重视研究美国的历史、文化、社会、人口、种族等因素，这样才能更好地解释并预测美国的深层次变化。

二是重视解剖与评判。当下的美国研究，迫切需要深入美国社会内部，打开“暗盒”，需要中国的研究者开展深入的实地调研，进行有价值的数据积累与分析。这是一个产生原创性观点的过程，也是“破”与“立”的过程。要对美国学术界的一些主流观点进行解构，如“美国例外论”“美国世纪论”，揭穿其“民主神话”“自由平等神话”“种族熔炉神话”“市场经济神话”等。要更准确地把握美国的国家性格与行为特征，特别是美国内部的种族主义特征和外部的扩张主义特征。要更好地揭示美国发展变化的重要规律与深层逻辑。

三是形成美国研究的中国特色。任何研究都是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互动，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认知和把握，其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带有研究者的烙印。构建中国美国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在我国学者产出的原创性成果的基础上，提炼基本概念、逻辑与理论，它能够有机地贯穿美国的历史与现实，并支撑和指导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领域的研究，从而建立美国研究各领域知识的内在逻辑联系，实现知识结构的体系化与系统化。这样的知识体系反映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角与关注重点，体现了他们对美国的独特理解与认知，并折射出其价值偏好。它不同于美国的美国研究，也不同于西方（如欧洲、日本）的美国研究，它是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审视，也是一个崛起大国同一个超级大国的对话。

漫谈构建我国美国研究自主知识体系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徐以骅

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攻读博士学位时，主修的是美国宗教史。导师约翰·F·威尔逊（John F. Wilson）教授原本属意我研究美国的“孔夫子”，即对美国宗教和文化具有奠基性影响的新教神学家、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但在面对爱德华兹大量论著以及研究文献，尤其是浩如烟海的相关手稿和档案资料时，不禁望而却步，在撰写了一篇关于爱德华兹与美国早期基督教传教运动的论文后，便转向美国圣公会在华传教史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对国内学者而言，美国研究的障碍存在于各个领域，要取得全方位或突破性进展，殊为不易。而我国的美国研究从介绍性和借鉴式研究到自主性和体系化研究的过渡，注定是一个渐进过程。

记得当年还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读美国史研究生课程时，导师刘绪贻先生受邀参加1984年6月在意大利贝拉吉奥小镇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该会议的组织者是《美国历史评论》的两位主编，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斯坦利·科特勒（Stanley Kutler）教授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斯坦利·卡茨（Stanley Katz）教授，他们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邀请了20位国际学者和4位美国学者参加此次研讨会，主要议题是国外的美国史研究，以及此种研究或所谓“从远处书写美国史”的利弊。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就有利之处而言，外国学者作为他者或局外之人，有可能摆脱美国流行史观（如美国例外论）、各种学术流派以及相关政治争端的影响，且具有综合以及跨国比较研究的优势，尤其在双边关系史、外交史以及思想史等领域；而不利之处则包括受各种条件尤其是资料和语言障碍的限制、难以摆脱美国学术研究的轨道，以及缺乏自主和系统性，等等。国外的美国史研究往往具有自身明确的社会、学术和政治议程，或他山攻错，或借题发挥，因此不太可能成为美国学术的“克隆”，但仍主要受美国史学的影响而不是反之。照某些与会者看来，国外的美国史研究目标或水准大致可被描述为“主要能胜任，间或有创见”。不过，此次研讨会的组织者也承认，尽管不少国际学者对美国史研究有许多真知灼见和重要建树，但美国史学界对他们的学

术贡献往往视而不见（参见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14, no.4, 1986）。

其实，美国史学界此种“学术傲慢”在各个学术领域都有明显表现。1997年4月8日，美国的著名中国历史学者柯文（Paul A. Cohen）在英国召开的理雅各逝世百年纪念会上发表“20世纪后期的中西知识交流”一文。该文指出，在近代史上中西传统的知识交流模式是所谓西方研究中国，而中国则主要是向西方学习，也就是西学东渐。到20世纪的后期，此种知识交流的不平等或不对等性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照柯文的说法，中国不仅要学习西学，而且还要向西方学习中学。该文引用了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海外研究丛书”序言中下面的这段话，即“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封闭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来加强上述观点。柯文将此种知识交流的不对等现象归之于诸如图书资料匮乏，长期出国研究和申请经费的困难，语言障碍以至优秀中文论著不为人知，以及长期以来美西方顽固不化的学术优越感，如日本在美国研究在美国同样不受待见，等等。当然，“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学术断层、缺乏学术批评以及合理的学术评价体制等也是造成此种中西知识交流不对等性的原因之一。

令人欣喜的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学界在美国研究领域已取得长足进步。学术研究的质优量足是一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体现。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必然对学术研究尤其是向来由西方主导的研究领域产生溢出效应；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国家利益的全球化，为我国的区域国别和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充分动力和资源；我国的治国理政和对外关系实践也为相关领域的学科发展提供了丰富案例；互联网等现代通信手段以及日益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极大便利了国内学者对相关信息资料的使用；而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共同利益或冲突，也大幅提升了中国因素在美国研究中的分量以及中国学者对该研究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尤其是在外交、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

以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为例，早在1963年毛泽东主席就在国际上率先指出了宗教学与国际关系学两大学科互动融合的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

国家安全观以及作为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方法论基础的“五个统筹”的精辟论述，是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发展，对于我国如何研究和处理国内外宗教问题具有指导意义。上述指导性思想为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跨国化与当代化，提供了学术上的可行性。全球宗教的“南升北降”、“第三教会”的崛起、中美宗教关系的相互交织以及全球影响，等等，为我国的美国宗教研究摆脱美式理论和话语体系窠臼，跳出美国宗教研究囿于基督教传教运动史的传统格局，提供了学术上的必要性。

“昨夜江边春水生，艤艫巨舰一毛轻。”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我国的美国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也不是“喊出来”而是“堆出来”的，刻意规划往往事与愿违；美国研究也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我国整个学术自主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即使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然要甘坐冷板凳，肯下苦功夫，不断积累、持之以恒，尤其是要加快和加强相关数据库的建设，从而为改变目前中西知识交流在某些领域的不对等性，以及建立我国的美国研究自主知识、学科和话语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构建美国经济研究自主学科体系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宋国友

构建美国研究自主学科体系，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可能是区域国别自主研究知识体系的重要突破点。美国研究自主学科体系有多个维度，美国经济研究自主学科体系自是题中应有之意。

构建美国经济自主学科体系，具有重大意义。从认识的角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美国经济的各种现象、政策，进而更好地认识其本质。美国经济到底是不是美国知识界和企业界所构建和认知的那个美国经济？从知识的角度，能够为全球知识社会更好地认识美国经济提供有益的理论贡献。从战略的角度，能为我们更为全面、客观、准确地认识美国经济实力的变化、美国经济问题提供自主判断，从而为中国对美外交提供坚实的研究基础。

对于美国经济研究自主学科体系的构建，可以参考国内经济学科设置并加以分析。国内的经济学设置为两大一级学科，分别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在理论经济学方面，包含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6个二级学科。在应用经济学方面，包含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和国防经济等10个二级学科。

如果以国内经济学学科构成为参照，有几点初步的结论。一是构建美国经济研究自主学科体系是必要的。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无论是从经济学理论本身研究出发，还是从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出发，都需要深入分析，但国内学界的美国经济研究，在上述不少二级学科领域是缺乏的，甚至是空白的。这凸显了必要性。二是构建美国经济研究自主学科体系是急迫的。一方面，从现实需求角度，美国经济近年出现了诸多新特征、新动向，需要学界加强研究。另一方面，从学术和学科角度，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散落在各个机构，未成体系，不利于成体系地推进美国经济研究，亟须通过学科体系建设加以凝练和增强。三是美国研究自主学科体系是有方向的。如何推动美国经济研究的学科体系建设？事实上，上述16个二级学科，绝大部分都可以作为研究美国经济的具体方向。

当然，务实而言，在国内经济学界或者区域国别研究学界中，完全研究美国经济的学者比例不会太高。对于美国经济的研究，学者可能更多的是从经济学理论和研究中国经济、世界经济相关性的角度加以切入。关于美国经济研究，如果一定要建立庞大、综合的大学科体系，不符合国内高等教育的现实。构建美国经济研究自主学科体系，当务之急以及真正的着力点恐怕还在于“自主”二字。当下有四个“自主”亟须努力。

一是概念自主。作为一门学科，必然有特定的概念。概念是自主学科体系建设的理论起点。自主学科体系需要建构一些自主性的概念，而不能完全在已有的概念体系中打转。鼓励概念自主并不是说一定要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不现实，也无必要。概念自主的关键在于能够通过一些独特的概念建构，更好地反映现象，进而更好地自主理解和阐释美国经济。例如，关于美元的国际作用，中国学者可以使用“美元霸权”这一概念，而不是美国学者倾向使用的“美元主导”这一概念。再比如，关于美国对外压迫性的经济政策，到底是用“经济胁迫”，还是美国自我认知的“经济制裁”？两个概念似乎并不相同。不同

的概念反映了不同的思考逻辑，必然也指向不同的价值判断。

二是视角自主。研究美国经济，主要有三种视角。第一种是美国视角。从美国看美国，把美国放在最为突出和重要的位置，这种视角反映了美国主体性。这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美国经济研究学者的主要视角。第二种是世界视角。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美国，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要从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视角看美国经济。第三种是中国视角。要从中国看美国，凸显中国经济的主体性，“以我为主”，把美国经济作为重要的外部变量对待。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中国视角应该是研究美国经济的第一视角。

三是议题自主。在研究议题方面，美国官员或学者不能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经济问题的出题者。中国学者要有独立的议题意识，不能跟随美国官员或学者所设定的议题进行研究，不能在美国官员或学者后面做相关美国经济议题的附和者或者证明人。中国学者不仅要多研究美国学者不愿意研究的议题，还要能够主动给美国经济学界出题，有力塑造美国学界的研究议程。中国学界和学者要能够自主识别美国经济方面的重大议题、真正议题和关键议题，防止被细节议题、虚假议题和次要问题所纷扰。

四是结论自主。结论自主不是说一定要与他人的研究结论有差异或者刻意唱反调，而是说要有独立的研究结论，不能以美国学界在相关经济问题上的结论为结论。哪怕最终的研究结论与美国学者或者政府部门得出的结论一致，但因为自主研究而得出，经过了验证，因此也算是自主结论，从而具有说服力和公信力。更为重要的是，还要有必要的质疑精神，要敢于得出与美国学界不一样的结论，还要尽可能争取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只要逻辑恰当、数据合理，要大胆地使用自主结论。和美国学界对话，自主结论更具有讨论意义。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研究，自主结论也更具有价值。

这四大“自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高度协同。缺少了任何一种自主，都难以真正构建较为完善的美国经济研究自主学科体系。同时，这四大自主也不是一蹴而就，相关专家和学者可以从自身学术情况和学科发展现实需求出发，着重在某一领域努力和发力。在美国经济研究领域的自主性成果越多，越有助于自主学科体系的构建。

当然，构建美国经济自主学科体系，也面临较多的困难。一是现有的经济

学学科大厦，特别是美国经济研究这一大厦的地基、框架等，已经打上了深刻的美国知识烙印。中国学者要获得美国经济研究的自主知识乃至打造自主知识体系，需要花大力气破除经济学理论的美国知识基因。二是对美国经济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对美国经济有长期、深入的分析跟踪。虽然在网络信息时代，获取美国经济的即时数据已经较为容易，但研判美国经济发展、理解美国经济问题，不仅需要短时间的访谈和田野调查，还需要更为长时间的驻美观察和经历。能否保障条件，保持耐心，这是挑战。三是从国内学界研究的现状看，美国经济虽然重要，但不少专家和学者是跨界研究、辅助研究、顺便研究甚至是蹭热点研究，尚没有成系统、更不用说成体系地研究。从学术影响和现实需求看，研究美国经济远不如研究中国经济重要。这也限制了国内学界打造美国经济研究自主学科体系的建设。

用阶级分析法剖析与批判美国数字霸权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蔡翠红

美国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意味着是有别于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可以是不同于西方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也可以是不同于西方的理论框架的运用，还可以是自主概念的提出，当然也可以是不同于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对象和议题。

在本体论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方法论即决定了理论的走向和特色。多数当代理论都以西方，尤其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为源头，其提出的方法论也往往避重就轻，甚至形成了美西方理论话语的闭环。在此背景下，可以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入手，探索有别于当前美西方主流的研究方法、思路和视角。

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划分为阶级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方法。阶级分析法可以帮助我们揭示不同阶级所处的地位、其利益诉求和斗争方式，以及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就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是一条被忽视的重要路径。尤其是在面对 21 世纪的新问题时，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仍

能以其无可比拟的理论深度发挥出应有的解释力。

可以运用阶级分析法来解构当前美国围绕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打造的数字霸权，通过阶级分析方法这一理论工具解释当下美国追求数字霸权的本质和动因。

从阶级定位的角度而言，美国数字霸权背后的阶级主体是政治经济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而其阶级利益关系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和战略三个方面。经济利益是美国争夺数字霸权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动力。美国科技公司通过垄断和控制全球的数据资源、数字平台和各类标准，获取了巨额的利润。政治利益是美国数字霸权的核心目标。美国政府通过支持科技公司的发展和扩张，以此获得引导全球舆论、操纵各国信息，以及进行网络攻击等行为的权力与合法性，增强美国在全球的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战略利益是美国数字霸权的根本保障。美国军方通过与科技公司合作，开发和先进的数字武器、设备和系统，提升了美国在全球的军事行动能力和安全保障。

美国数字霸权带来的阶级效应也十分显著，主要表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在国内层面，美国数字霸权加剧了阶级分化和不平等，科技公司及其股东成为社会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群体，而其他行业和阶层则面临着就业压力、收入下降、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在国际层面，美国数字霸权造成了大型企业的垄断，产业链低端的企业受到压榨和剥削。美国科技公司通过收购、合并、排挤等手段，消灭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潜在竞争者，同时也控制了全球的数字供应链，使得其他国家和地区只能从事低附加值、高风险、高污染、高能耗的数字生产活动。

从本质上来说，美国数字霸权就是美国的数字资本通过技术和资本优势，实现对全球数字领域的垄断和剥削，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并提升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阶级分析法还告诉我们，数字技术是美国霸权建立的基础，是实现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体现出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

首先，美国数字霸权的取得是建立在强大的科技产业基础之上的。美国拥有众多的科技巨头，这些科技巨头及其股东组成了美国数字经济的统治阶级，代表了数字资本的利益。他们通过收集和分析海量的数据，创造和提供各种数字产品和服务，获取了高额的收入和利润。

其次，美国数字霸权体现了美国整体资本主义阶级的利益。目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通过垄断关键数字技术，美国可以更好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秩序，提高资本积累效率，从而巩固其在全球的统治地位。因此，美国数字霸权是美国整体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所在。他们通过推动数字全球化，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攫取超量的剩余价值。

再次，美国数字霸权建立在对其他国家数字劳动力的剥削之上。谷歌、Meta等通过控制海外市场和数据，对这些外国用户的数字劳动进行剥削。网络用户在使用这些科技公司提供的免费或低价服务时，实际上是在向它们提供自己的个人数据、行为习惯、消费偏好等信息，这些信息被这些科技公司用来创造更多的价值，并以此获取更多的利润。这种利润并没有被平均分配给网络用户，而是被这些科技公司垄断。这就是数字劳动剥削的本质。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导致了美国数字资本对其他国家数字劳动力的剥削。

最后，通过对标准制定权和上游关键技术的控制，美国实现了对技术的垄断。而其他国家为了参与数字经济，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技术和标准，这使得美国获得了数字领域的制度收益和技术租金，并构成了美国数字霸权的全球价值链支配地位。美国通过控制数字领域的平台和标准，规定了其他国家参与数字经济的规则和条件，从而获取了更多的利益。

美国数字霸权的形成是出于美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需要，同时，美国对技术霸权的追求也与数字技术本身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和政治意义紧密相关，这是美国追求数字霸权的驱动因素。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上，数字技术催生了新的战略性产业，而数字霸权则确保了巨大的商业利润。美国的数字企业依靠技术优势迅速崛起，带动了整个美国经济的发展。通过数字霸权，美国可以加速资本积累，获得持续的经济收益。这些数字企业及其股东组成了美国数字经济的统治阶级，代表了数字资本的利益。这些科技公司及其股东不仅享受着数字经济带来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决策，与美国政府和军方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第二，在政治上，数字技术事关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全球影响力，而数字霸权则保证了这种影响力的稳固。数字基础设施、5G等前沿技术将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前景。对于美国而言，掌握数字技术可以提升国力并维护其在国际

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美国政府通过支持和监管科技公司，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舆论引导、信息操纵、网络攻击等，增强了美国在全球的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

第三，在意识形态上，美国主张互联网是自由开放的空间，倡导“美国例外论”，反对各国政府对数字领域的监管。这不仅有利于美国数字企业不受限制地在全球扩张，对核心数字平台控制也有利于美国绕开主权国家的监管而大肆传播其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数字平台的强大传播能力，成为维护美国意识形态优势的重要依仗。同时，美国主导下的技术标准也将其价值观嵌入数字产品和服务之中，以获得持久的政治经济影响力。

第四，在安全上，通过监控全球互联网，美国可以更好地掌握海外情报，服务于其全球战略。数字领域的控制力直接关乎国家安全利益，例如，美国通过互联网基础设施来窃取其他国家公民甚至领导人的个人数据，甚至通过网络行动获取我国的敏感信息和战略情报。此外，美国还通过利用网络漏洞和后门，对其他国家进行网络渗透和攻击。如今，数字监控能力已经成为美国开展全球反恐、维护霸权的重要手段。

美国数字霸权建立在美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意识形态需求以及安全需要之上，体现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而美国资产阶级也通过控制和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对全球数字领域的主导和剥削，从而维护和扩张了自己在全球的统治地位。这是美国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体现了美国整体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诉求。正因如此，美国政府和资本会不遗余力地维护其在数字领域的统治地位。利用阶级分析法审视美国数字霸权，可以深入认识其政治经济基础、国内外的连锁反应，以及蕴含的阶级矛盾与斗争。与此同时，对美国数字霸权的阶级分析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有益探索，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评估这一现象的本质和影响，也有助于我们建立美国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